

隐藏的秩序：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 悬浮表征与落地路向

林克松 曾欢

【摘要】受专业群建设本身所具备的模糊性程度和冲突性程度,以及高职院校自身行动逻辑的影响,一些高职院校选择“纸上谈兵式”“命令服从式”“趋易避难式”和“名不副实式”的“悬浮化”专业群建设行动。为推进专业群建设落地,需明确专业群建设标准及优化建设环境,重塑实践性行动逻辑;嵌入专业群建设“时间—结构—关系”维度,完善适当性行动逻辑;基于专业群建设“标准+特色”的弹性考评,优化结果性行动逻辑。

【关键词】双高计划 高职院校 专业群建设 “模糊—冲突”模型 行动逻辑

专业群建设是推动高职教育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支撑产业转型升级、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载体。^[1]如何有效推进专业群建设是高职院校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然而,当前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存在盲目建群、片面整合、融合乏术、忽视过程、偏重结果等问题^[2],面临“悬浮化”的风险。在“双高计划”建设近两年之际,有必要审视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实践乱象及其运行秩序。

一、高职专业群建设的“模糊—冲突—行动”分析模型构建

(一)“模糊—冲突”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政策过程的核心难题并非存在于政策制定阶段,而是执行阶段中的“执行偏差”,而政策属性和政策执行者行动选择等因素影响政策执行。^[3]其一,就政策属性而言,目标模糊程度与政策执行绩效呈负相关^[4],政策设计者采用模糊性的语言掩盖了可能存在的冲突,使得政策执行矛盾重重^[5],当政策执行手段模糊不清时,政策执行者根据情境选择一定的“转化工具”,趋易避难、简单行事,最后带来政策执行偏差。^[6]其二,就政策执行者行动而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相关行动者按照个人意愿与偏好对政策文本进行“转译”,以期使自身价值和利益得以观照和体现。然而在现实中,由

于“强制通行点”受到行动者阻碍机制的影响,行动者的转译偏向于各自利益的实现,导致执行困局。^[7]

查德·马特兰德把政策属性与政策执行者行动纳入政策执行过程中进行系统分析,认为政策属性一定程度决定了政策执行的方式,并进一步将政策属性划分为“模糊性”与“冲突性”,通过交叉组合分析,根据政策的模糊性与冲突性程度上的差别,将政策执行模式划分为四类:“低模糊性—低冲突性”的行政性执行、“低模糊性—高冲突性”的政治性执行、“高模糊性—低冲突性”的试验性执行、“高模糊性—高冲突性”的象征性执行,分别受资源、权力、情境、联盟力量等要素支配,由此构成了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模型。^[8]马特兰德提出的“模糊—冲突”模型对于揭示高职专业群建设“悬浮化”的隐藏秩序和外在表征具有较高说服力,因为高职专业群建设建基在“双高计划”政策语境下,受到政策模糊性与政策冲突性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及资源、权力、情境、联盟力量等要素支配,从而导致不同高职院校在实践场域选择不同类型的专业群建设行动。

(二)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模糊—冲突—行动”模型构建

专业群建设不仅建基在“双高计划”宏观政策

收稿日期:2021-06-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基于人才链匹配产业链的高职院校专业群建构的内在机理及实施路径研究”(BJA190103)

作者简介:林克松,西南大学教育学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副教授,教育学博士;曾欢,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情境中,也建基在“双高计划”项目治理情境中,“模糊—冲突”模型不能合理解释高职专业群建设悬浮的内在机理,也难以构建高职专业群建设落地的行动路向,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模糊—冲突”模型本身是静态的,只能分析时间横截面上政策属性对执行结果的影响,并未将历时性因素纳入考虑范围,更与现实的动态性与复杂性脱节;另一方面,运用“模糊—冲突”模型需要结合本土情境。马特兰德所提出的影响政策执行要素,很大程度适用于西方情境,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我国情境。^[9]为更好地将“模糊—冲突”模型与高职专业群建设相结合,需对“模糊—冲突”模型进行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修正,从而构建“模糊—冲突—行动”模型。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修正。

第一,进一步细化模糊性与冲突性的衡量标准。对于模糊性,具体以“双高计划”政策为样本,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入手,对“双高计划”政策进行解构与分析;对于冲突性,着重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高职院校价值诉求、高职教育改革发展规律等方面进行考量。

第二,微观动态性修正“模糊—冲突”模型。为避免遗漏影响高职专业群建设“悬浮化”的关键因素,需要对以往的“示范校”“优质校”等高职项目进行历时分析,研判高职项目治理中的专款专用、政府权力嵌入、因绩留痕、效率至上等因素是否是高职专业群建设“悬浮化”的诱因。

第三,引入“行动”变量,提出高职专业群建设落地的行动策略。“模糊—冲突”模型只提供寻找影响执行结果因素的地图,没有明确应构建怎样的行动逻辑,采取怎样的行动路向。事实上,高职专业群建设取决于高职院校的利益权衡、相关政策文本的可操作性、高职专业群建设的规范性,内隐着高职专业群建设所需遵循的结果性、实践性和适当性三种行动逻辑。要推进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落地,需重塑实践性行动逻辑、完善适当性行动逻辑和优化高职专业群建设的结果性行动逻辑。

二、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悬浮表征

(一)资源依赖下的低模糊—低冲突:“纸上谈兵式”行政性专业群建设

项目制有力推进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通过财政和行政激励对高职院校重点专项扶持,形成项目的政策性资源集中优势^[10],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正

是因为政府所提供的政策性资金资源对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决定了高职院校对政府的资源依赖。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必须与其依赖的环境互动,以获得组织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外部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目作为一种完全受政府管控的“类市场治理模式”,不断诱导着高职院校向上争取资源。^[11]因此,专业群建设作为“双高计划”的子项目,其专项资金投入清晰,支撑着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

项目制是政府技术化治理的重要表现形式,政府为了产出更多绩效,推出以目标责任制为代表的治理手段,呈现出行政问题技术化、技术问题数量化的态势,充斥着“为邀功而造痕”的痕迹主义行为。^[12]以往的“示范校”“优质校”从项目立项前的申报论证到项目建设中的过程监控再到项目结束后的验收评价,仍有浓厚的“处处留痕、事事留迹”的留痕主义色彩,这就给了高职院校一个重要信号:只要按照专业群建设的相应考核指标对审核材料进行精包装,便能完成各阶段的考核验收。由此带来“指标化”专业群建设方案与“量化型”成果验收的低冲突,使得高职院校选择“纸上谈兵”式行政性专业群建设行动,聚焦于专业群“做材料”的纸上作业和“编数据”的技术加工。

(二)权力主导下的低模糊—高冲突:“命令服从式”政治性专业群建设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作为“双高计划”建设项目中的关键目标和重要内容,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专业群建设都是“自上而下”的行动,政府成为职业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制定者、解释者和裁判者。^[13]如此,政府权力的单向度嵌入给高职院校释放出这样的信息:申报“双高计划”项目,建设高水平专业群是政府的行政命令。因此,高职院校把专业群建设作为一种行政命令去行动的意识并不模糊,学校只要参与专业群建设就意味着已经服从政府的行政命令。然而,高职院校把专业群建设作为一种行政命令去服从,就会带来一系列冲突。

一方面,政府控制权与高职院校自主权冲突。在政府单向度权力嵌入语境下,政府以项目的形式划拨经费,这虽然是对高职院校服从“双高计划”项目规划的正面鼓励,也是避免产生项目经费“一放就乱”困局的有效途径,但由于项目经费受中央“发包”和政府“打包”运作机制影响,高职院校难以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而自主决定经费的分配

和使用。由此,项目经费不是为高职院校的改革服务,反倒是高职院校的各种专业群建设的变通活动为项目经费服务。

另一方面,追求效率至上与高职教育改革发展规律冲突。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自上而下”定期成果验收,不符合高职教育改革发展规律,从而导致高职院校“自下而上”的反控制行动。高职教育改革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运行的客观规律,是一个循序渐进、长期发展的过程,仅仅以五年为一个建设周期显然短促。面对效率与规律的冲突,高职院校在与政府互动中,以“弱者身份”自居,自然有属于自身的“武器”来建设专业群,即严格按照建设方案中的量化指标,通过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对专业群建设中的各项子任务进行盲目发力,但在每项子任务中并无创新和突破。这种政治性专业群建设方式必然隐藏着看似在行动实则无成效的“揠苗助长”式专业群建设逻辑。

(三) 情境依附下的高模糊—低冲突:“趋易避难式”试验性专业群建设

政策过程的运行并不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内嵌于其所特有的政策情境之中。这种政策情境主要是指政策路径的明晰度,即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明晰度。根据“有限认知”假设,由于决策者的认知有限,公共政策并非都有明确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14]反观“双高计划”关于“打造高水平专业群”的具体规定发现,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模糊度较高。就政策目标而言,虽提到要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推动“课堂革命”等,但这些目标所涉及的“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产业需求侧结构”“课堂革命”等相关概念却具有高模糊性。就政策工具而言,政策文本中虽提到具体的建设任务,如“健全对接产业、动态调整、自我完善的专业群建设发展机制”“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等,却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应该采取财政手段、行政手段或市场手段来健全和组建,也没有明确规定具体建设任务所对应的绩效考核标准。

在政策决策中,政策目标和政策路径的模糊化一定程度上是减少冲突的一种策略。学校不同于其他机构,其目标界定与业绩表现评价本来就存在一种模糊性特征,组织内部的活动也根本不存在明晰的标准与技术路线。^[15]在这个意义上,只要学校有建设专业群的痕迹,便能通过专业群建设绩效考核。于是,模糊的政策路径与专业群

业绩考核冲突度低,一定程度为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释放出了模仿活动的空间。组织模仿理论认为,模仿是诱导组织行为趋同的制度因素之一,当组织在相对自主的制度环境中面临不确定性时,组织为求自身生存与发展,将其他组织行为作为参照对象,并据此制定自身的行动决策。^[16]由此,高职院校基于趋易避难的建设思路,把专业群建设经验丰富的高职院校作为模仿对象,着重从专业群构建、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团队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维度进行整体规划,以减少自主探索可能付出的成本代价和失败风险。

(四) 联盟力量下的高模糊—高冲突:“名不副实式”象征性专业群建设

按照资源基础理论,任何一个组织若要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通过联盟网络获取外部潜在资源和技术是组织成功创新的关键。^[17]通过与其他高职院校、企业缔结直接或间接网络关系,实现外源知识、技术和资源流动,已成为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的持续动力。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盟网络是指由高职院校和企业为了共同目标而形成的网络关系。联盟关系强度反映联盟伙伴成员之间的紧密性和信任度,若联盟伙伴成员之间互动较勤、资源投入多、合作愉快,则联盟网络的关系强度增强。然而在实践中,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存在高模糊性,究竟是合作伙伴关系还是服务与被服务关系,难以定位,从而导致企业与高职院校间的合作动机不足,与高职院校间的紧密度和信任度较弱,高职院校与企业间的联盟实为有名无实的低效联盟。

在联盟关系高模糊性情境下,高职院校与企业在联盟网络中存在两对冲突,即联盟目标冲突和联盟实力冲突。其一,联盟目标冲突表现在高职院校希望通过与企业联盟,能够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等产业先进元素纳入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而企业希望通过与高职院校联盟,借助学校场地和实训设备,满足其生产需要,两者目标冲突导致院校与企业之间结成的联盟仍然是名存实虚的弱联盟。其二,联盟实力冲突表现在当前行业内标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研发能力强,高职院校科研水平与其不匹配,校企之间的实力悬殊,导致校企之间的联盟难以形成长效机制,最终形成名实偏离的联盟形态。

三、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落地路向

(一) 明确专业群建设标准及优化建设环境,

重塑实践性行动逻辑

实践性行动逻辑强调,没有实践,理念无法成为行动,行动者必须依照一定的可实践性的理念和环境才能采取与行动者资质相符合的行动。^[18]在此意义上,通过完善一整套具有可操作性的高职专业群建设标准,营造高职专业群建设的良好生态,才能重塑高职专业群建设的实践性逻辑,确保高职院校在专业群建设上有据可依、持续发力。

第一,明确一整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设标准,确保高职院校在专业群建设上有据可依。一方面,教育部应出台高职专业群建设的国家标准,对专业群建设与区域产业链的对接程度、专业群人才培养目标与学生毕业要求、企业岗位需求的匹配程度、学生技术技能水平与行业标准的符合程度,以及专业群动态调整标准等维度进行详细说明。由教育部研究决定的专业群建设标准为高职院校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骨干专业(群)提出了建设要求与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基于教育部高职专业群建设的专项政策文件精神,全面深入调研当地产业群发展现状、特征、局限与优势,在充分了解高职院校、企业、学生、家长的价值诉求和权衡高职院校利益得失的基础上,采取逐步深入、循序渐进的方式对高职专业群建设的国家标准加以调适,以增强高职院校对专业群建设标准的适应性,促进高职专业群建设的具体化和条理化。

第二,营造高职专业群建设的良好生态,确保高职院校在专业群建设上持续发力。专业群建设政策要化为高职院校的执行行为,必须经过高职院校对专业群建设政策进行消化和理解,倘若专业群建设环境不能对专业群建设行动进行有效制约,高职院校就有可能依据自身的利益做出有悖于专业群建设政策制定者政策意图的“趋易避难式”试验性专业群建设行动。为此,需从两方面优化政策执行环境,营造高职专业群建设的良好生态。一方面,政府作为高职专业群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面对现阶段可能限制各高职专业群建设的资金、师资等困境,各省市主管部门应建立政府、市场多方参与筹措的经费投入机制,成立专款专项,向各立项单位定期划拨定额补助,到高职专业群建设中、后期,可以适当削减拨款额,改为中央拨款和各高职院校自筹的方式,防止各高职院校等、靠、要,提升专业群建设政策的执行力。另一方面,政府需建立独立于高职院校的“双高计

划”政策监督机构,赋予其职责相一致的权力,严格执行“双高计划”政策,切实落实专业群建设的常态化监督,对专业群建设中存在失真、失衡、错位、异化等现象的高职院校进行及时纠偏与规范。

(二)嵌入专业群建设“时间—结构—关系”维度,完善适当性行动逻辑

适当性行动逻辑强调,行动者应采取与自身身份相符合的且合乎规范的行为。在此意义上,高职院校在专业群建设上必须符合自身身份,且合乎规范。事实上,专业群建设的合规范性,取决于高职院校自身在专业群建设上的嵌入状况。“嵌入”强调不同的力量、结构与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运用嵌入性理论框架,从时间嵌入、结构性嵌入、关系性嵌入三个维度来探讨高职专业群建设过程,可以完善高职专业群建设的适当性行动逻辑。

其一,在“时间嵌入”维度,通过“在建设中规划、在规划中建设”间隔推进,规范专业群建设行动。时间嵌入,强调过去的行动方式会形塑下次行动的路径。在实践场域,并非所有高职院校在专业群建设之前都能有一个完整清晰的专业群建设方案和具体行动路径,只能遵循“在建设中规划、在规划中建设”的逻辑理路,在探索路径中规划,在完善规划中修正路径,从而避免专业群建设成为高职院校中的静态文本材料或动态短时运动,进而实现专业群建设真正落地。通过对2019年和2020年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群建设方案对比发现,金华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实践探索,不断调整建设内容、预期成效和经费预算,从而完善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群建设方案。在培养“中国工匠”这一任务上,增加“实施三级递进的‘赛教融合’改革”这一子任务;把学生以“赛教融合”参与竞赛人次2000人次纳入预期成效中;在“教学改革”预期绩效指标上,新形态教材编写从10本增加到30本;预算总经费从23400万元缩减到22900万元,进一步明确申请地方财政投入资金5400万元。

其二,在“结构性嵌入”维度,通过“试点中试点”结构嵌套,激活专业群建设的示范辐射效应。结构性嵌入强调一事物进入他事物(结构)中时,带着这一事物(结构)复杂的社会关系^[19],能够拓展每一双边关联至结构中的个体或团体实现系统性的联结。^[20]当前,对于没有专业群建设经验的试点院校,如果全面铺开建设专业群,将会有一

定挑战,且有可能完成不了短期、中期或长期的绩效考核,甚至可能导致大量资金投入但效果不佳的风险。因此,试点院校在学校内遵循“先行先试—典型示范—由点及面—逐步推广”行动逻辑,形成试点当中有试点的以点带面嵌套模式,不仅能减少由于政策模糊所带来的政策执行风险,而且可以弱化和钝化专业群建设阻力,集中投入打造特色,激活以点带面的示范辐射效应。具体而言,需要注意三点:一是基于政策文本内容和学校人力、财力、物力等情况的考量,选取与区域产业对接密切的相关专业,将学校中特色类、优势类专业作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试点,避免目标太高冒进求成或目标过低只重眼前的现象。二是制定引导教师群体专业群建设的激励机制,激发全员主动参与专业群建设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防止院校内专业群试点建设的集体行动断裂。三是打破院系高墙,积极探索试点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具体路径,并在探索建设过程中不断总结成功经验与不足,逐渐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建设方案和实施路径,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其他专业群建设试点起到示范引领作用,逐步推进学校内专业群水平的整体提高。

其三,在“关系性嵌入”维度,以专业群建设为契机,优化学校治理体系、整合专业教学资源。关系性嵌入主要强调网络的关系特征和联系强度的重要性。高职专业群建设关系到专业群内部各专业之间的互相提携,以及专业群内部教学资源的有效配置,真正让专业群活起来,实现聚合效应。这就需要各高职院校一要以专业群建设为契机,优化学校管理制度,如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对校内原有二级学院和专业进行了一番整合、重组和优化;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借助跨学院设立的供应链研究院,进行相关资源集聚和协调建设。二要融合专业群内教学资源,促进专业群内部教学资源的有效配置,如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群以典型岗位的技术技能要求构建课程体系,共享专业平台课,交叉共享专业方向课,专业群内共享课程资源、师资团队、实训资源和合作企业,从而形成专业群建设与人才培养合力。

(三) 基于专业群建设“标准+特色”的弹性考评,优化结果性行动逻辑

结果性行动逻辑强调,行动者能够根据自身利益需要,理性选取可以最大限度实现目的的行

动。在此意义上,高职院校在专业群建设上取决于利益的权衡。当前,教育部、财政部印发《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为高职院校自评提供了《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数据采集表》,其中所涉及的3个一级指标、6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无疑为高职院校在专业群建设上的发力提供了指南。然而,专业群建设是建设主体、建设环境和建设任务等因素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绩效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同一量化的评估系统能解决的问题。换言之,由于每个高职院校的专业基础、办学条件、所处区域的产业发展情况和教师群体素质差异等,各院校专业群建设的难易程度各异。加之,高等职业教育评价具有高度的情景生成性、功效滞后性和专业内控性,既强调价值、追求效率,又关注过程、重视改进。因此,高职专业群建设绩效评估在重视指标内容设置和指标赋值时,需要采取标准与特色的弹性考评方式,从而优化专业群建设的结果性行动逻辑。

第一,明确标准化建设各项考核指标的基础项和提升项,确保标准化建设各项指标的客观性与可操作性。一是按照定性与定量、统一性与个别性相结合的原则,明确高职院校专业群标准化建设各项指标的内涵与外延,在追求各项指标实事求是、全面准确的基础上,努力做到指标粗细均匀,提高专业群建设标准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科学性,从而防止因片面追求大而全而导致的繁琐冗余,避免运动式和跟风式的专业群建设;二是将评估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到专业群建设的过程中,促成专业群建设工作形成自我约束,自觉将标准化思维、理念融入到专业群建设中,促使高职院校在标准化专业群建设中能够进行自纠自查,及时调整并优化专业群建设方案。

第二,综合考量学校自身的办学基础和办学条件,将特色化发展纳入专业群建设成果验收中。将特色化作为专业群建设成果验收的重要指标,意味着强化结果导向,重点关注专业群建设是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是否提升社会满意度等。以此导引高职院校根据自身所处区域的产业发展特点,重点强化与区域产业群及产业链对接的专业群建设优势和发展基础,着力打造能凸显学校特色且对区域产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高水平专业群,积极致力于基于特色专业群建设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等方面的改革,从而形

成独具个性化的专业群建设范式和具有推广价值的专业群建设经验。

参 考 文 献

- [1] 任占营.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变革意蕴探析[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9(6): 4-8.
- [2] 崔志钰, 陈鹏, 倪娟.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 意义辨析·问题剖析·策略探析[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0(6): 136-140+181.
- [3] 胡业飞, 孙华, 傅利平. 政策执行研究“第三阶段”的核心议题与理论逻辑进阶[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0(3): 96-105.
- [4] HAN C Y, RAINEY H G. Goal ambiguity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 U. S. Federal Agencies[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5(4): 529-557.
- [5] 周芬芬. 地方政府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的执行策略[J]. 教育与经济, 2006(3): 61-64.
- [6] 胡业飞, 崔杨杨. 模糊政策的政策执行研究——以中国社会养老政策为例[J]. 公共管理学报, 2015(2): 93-105+157.
- [7] 罗峰, 崔岩殊. 行动者转译偏差: 政策执行何以陷入“困局”? [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0(2): 4-15+124.
- [8] MATLAND R E. Synthes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literature: the ambiguity-conflict model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 Theory, 1995, 5(2): 145-174.
- [9] 王洛忠, 都梦蝶.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 [J]. 行政论坛, 2020(5): 69-80.
- [10] 王雅静. 教育项目制: 高职教育的项目治理逻辑[J]. 现代教育管理, 2020(2): 123-128.
- [11] 刘云波, 杨钊. 项目制下的高职院校分化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4): 98-104.
- [12] 林克松, 许丽丽. “双高”时代高职专业群建设与治理体系改革的共同演进[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0(5): 134-139+164.
- [13] 林克松, 许丽丽. 课程秩序重构: 高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逻辑、架构与机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9(6): 125-131.
- [14] BAIER V E, MARCH J G, SAETREN H. Implementation and ambiguity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1986, 2(3-4): 197-212.
- [15] 阎光才. 政策情境、组织行动逻辑与个人行为选择[J]. 高等教育研究, 2019(7): 33-45.
- [16] 吴月. 隐性控制、组织模仿与社团行政化——来自S机构的经验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4(3): 106-117+143.
- [17] 孟卫东, 杨伟明. 联盟组合中资源整合、双元合作与焦点企业绩效关系研究[J].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8(2): 85-94.
- [18] 秦亚青. 行动的逻辑: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12): 181-198+208.
- [19] 王思斌. 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J]. 社会科学战线, 2011(2): 206-222.
- [20] 彭正银. 网络治理: 理论与模式研究[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117.

Hidden Orders: The Suspended Characterization and Landing Direction of Major Cluster Construc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n Kesong, Zeng Huan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uzziness and conflict degree of the major cluster construction itself, and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mselves, som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chosen the “suspended” major cluster construction action of “talking on paper”, “command obedience”, “easy to avoid difficulties” and “not worthy of nam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jor cluster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ajor cluster,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major cluster construction standards and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to reshape the practical action logic; embed the “time-structure-relationship” dimension of the major cluster construction to improve the appropriateness action logic; based on “standards + characteristics” flexible evaluation of the major cluster construction to optimize result action logic.

Key words: construction plan of high-level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specialtie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ajor cluster construction; ambiguity-conflict model; operational logic (责任编辑 任令涛)